

一月

一日，段祺瑞电邀孙中山、黎元洪出席“善后会议”，邀胡适等三十人列席。同日，中国国民党中央执委会发表宣言，指出“废除不平等条约”之极端迫切性和重要性。

十一至二十二日，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举行，着重讨论加强对革命运动的领导，提出了无产阶级对民主革命的领导权和农民同盟军问题。

十七日，孙中山复电段祺瑞，反对段所包办的“善后会议”，提出参加会议的两大条件。（按，孙已于上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扶病到京）随后，成立于上年十二月二十日的广州国民会议促成会组织十万人游行，反对“善后会议”。

近日以来，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学生对校长杨荫榆意见颇多。本月十八日（有说十六日、十七日者），女师大学生自治会召开紧急会议，讨论驱逐杨荫榆的方针。全校共有学生二百三十七人，其中一百七十二人态度积极，坚决要求驱杨，另六十五人缺席，声明中立，但不反对驱杨的做法。会议决定，自本日起，不再承认杨为校长，并称这一运动为驱“羊”运动。当时起草了《驱杨宣言》，但并没有立即公布，而是选派学生代表赴教育部诉述杨荫榆治校以来种种黑暗情形，要求撤换，同时“婉劝”杨辞职。因未达目的，于二十一日将宣言发表。女师大风潮由此正式展开。

二十八日，中国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移驻北京。

三十日，北京美术专门学校学生反对北洋军阀政府教育部委任的新校长到职，教育部派军警将该校强行解散。

三十一日，作为中国革命统一战线组织形式的国民党中央总部，根据孙中山指示，通令全党，抵制“善后会议”。

一日 晴。午伏园邀午餐于华英饭店，有俞小姐姊妹、许小姐及钦文，共七人。下午往中天看电影，至晚归。

【笺】

伏园邀午餐于华英饭店，有俞小姐姊妹、许小姐及钦文 伏园（1894—1966），姓孙，名福源，后改伏园，字养泉，笔名柏生、松年等。著名编辑家，作家。浙江绍兴人。四岁丧父，家境贫寒。一九一一年入山会初级师范学堂，时鲁迅任该校监督，成为鲁迅的学生，后又做周作人任教浙江第五中学时的学生，对“二周”都以弟子称。一九一八年入北京大学国文系旁听，次年改为正科生，并任北大图书馆馆长李大钊的秘书。一九二一年毕业。在校时参加新潮社，任干事部干事兼编辑部编辑。一九一九年业余任北京《国民公报》副刊编辑。一九二〇年任北京《晨报》副刊编辑，次年副刊独立成为附刊（即《晨报副镌》），为当时名刊之一。一九二一年一月四日，跟郑振铎、沈雁冰（茅盾）、叶圣陶等人发起成立了我国“五四”后第一个文学社团文学研究会。一九二四年夏以记者身份跟鲁迅等人赴西安讲学。十月，因鲁迅《我的失恋》被代理总编刘勉己撤下愤而辞职，离开《晨报》。旋被《京报》邵飘萍请去。时在《京报》，主编副刊。俞小姐姊妹，即俞芬、俞芳、俞藻。浙江绍兴人。其父俞英崖（1876—1955），民初在吉林省任延吉县知事，后在中东铁路局工作。因事到北京后跟鲁迅相识。一九二三年鲁迅跟周作人失和后，搬到砖塔胡同六十一号暂住。此处房产属俞英崖的一位同事所有，自家只有母女二人，空房较多。俞家三姊妹一九一九年由哈尔滨来到北京，住在这里，现在跟鲁迅成了邻居。俞芬（1899—1960），字馨如，到京后入北京女高师附中读书，一九二四年毕业后任家庭教师，间或到北京大学旁听鲁迅的课。俞芳（1911—2012），小大姐十二岁，一九二四年由笃志小学转入培根小学时，鲁迅为其作保。本年在女师大附小读书。一九三五

年毕业于北平师范大学数学系。在北师大肄业期间，经常到西三条鲁寓照料，曾为鲁母代笔给鲁迅写信。俞藻又小两岁，一九一三年生。一九二四年入培根小学读书时，鲁迅同为作保。许小姐，指许羨苏（1901—1986），字淑卿，《日记》又作璇苏。浙江绍兴人。许钦文四妹，周建人在绍兴女子师范学校（原明道中学）教书时的学生。一九二〇年到京投考女子高等师范学校，住在八道湾鲁寓。一九二一年周建人赴上海工作后，由鲁迅担任她的监护人，并曾担任上学的保证人。一九二四年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数理学系毕业，在私立翊教女中任数学教员，后鲁迅介绍到私立华北大学附属中学任教。女师风潮平息后，鲁迅又介绍她到女师大图书馆工作。她常在鲁寓帮忙，跟鲁太夫人相处甚好。钦文（1897—1984），姓许，原名绳尧，笔名钦文、蜀宾、田耳、游山客。现代作家。浙江绍兴人。一九一八年六月浙江省立第五师范学校毕业，留母校附小教书。一九二〇年到北京，入交通部铁路职工教育讲习会，毕业后被分派到津浦路浦镇去创办职工学校。后在北京给《法律评论》杂志做抄写、校对等杂务，在北京大学旁听鲁迅的课，同时开始写小说。一九二三年由孙伏园介绍跟鲁迅相识，经常往来。俞芳在《杂忆鲁迅先生与少年儿童》中详细记叙了这次“请客”情景：

一九二五年元旦，鲁迅先生的学生孙伏园先生（当时任北京《京报》副刊编辑）邀请鲁迅先生、许钦文、许羨苏兄妹，还有我们三姐妹在北京华英饭店吃中饭。席间，孙先生热情周到，点了许多名贵菜肴，大姐笑着说：孙先生今天请客，大先生（鲁迅先生）是主客，许家兄妹和我是陪客，老二、老三（指我和三妹）大概是“吃客”了。我听了大姐的话，心里想，我应该吃得斯文点。想不到，鲁迅先生却接着说：“我认为老二、老三是主客，因为她们难得到馆子里来吃饭，我们大家都是陪客。”停了一下，他又说：如果在陪客中还要分出“吃客”来，那么，许家兄妹和房东（大姐）你，就算“吃客”了。鲁迅先生幽默的话，引得大家都笑了。我一边笑一边想，大先生真好，处处帮我和三妹说话，他把大姐他们说成“吃客”，很有道理，本来嘛，我们这样小，那里吃得过她们。饭桌上的气氛，也因鲁迅先生风趣的话语，活跃起来。

鲁迅先生食量不大，每盘菜肴上来，只吃一点就放下筷子，但他很关心我和三妹，鼓励我们放开肚量吃。他说：吃得好，吃得多，将来长得结实。他还和许家兄妹、大姐们开玩笑说：不要只管自己吃，要照顾照顾两位小客人。这样一讲，孙、许两位先生，许姐姐和大姐都给我们夹菜，我和三妹吃得好开心，一点都不拘束。

（《上海鲁迅研究》第6辑第52-53页）

华英饭店，在西长安街。

下午往中天看电影 前引俞芳话后接着说：“饭后，孙先生邀请鲁迅先生和我们大家去看电影。到哪个电影院去呢？孙先生征求鲁迅先生的意见，鲁迅先生想了一想说：还是到‘中天电影院’去好，因为那里放映的片子，是适合中、小学生看的，适合小客人们看。孙先生点头称是。那天放映的是美国片子，内容是体操表演，柔软操、高低杠等等技巧表演，运动员们的动作灵活轻巧，姿势优美。在电影休息时间，鲁迅先生对我们说：这样纯熟的技巧，全是从小锻炼出来的。电影看完，鲁迅先生对这部电影给予很高的评价，他说，以后有这样好的片子，再来看。走出影院，天已傍晚，我们依依不舍地和鲁迅先生告别。”（同上第53页）中天电影院，地址不详。

【补】

作散文诗《希望》，载《语丝》周刊第十期（19日），副题《野草之七》，署名鲁迅。作者在《〈野草〉英译本序》中说：“因为惊异于青年之消沈，作《希望》。”此文以“我的心分外地寂寞”开头，既寂寞又平安，平安是因为既没有希望也没有绝望，“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有书上说它“表现了作者寻求新战友，探索新道路，要同黑暗势力战斗到底的决心。”笔者同意。但说它“表现了作者既感到希望的渺茫，更觉得绝望也是虚妄的思想矛盾”，还值得商榷。因为“绝望也是虚妄的”，正可以促进希望的实现。文中的“倘使我还得偷生在不明不暗的这‘虚妄’中，我就还要寻求那逝去的悲凉缥缈的青春，但不妨在我的体外。”是全文主旨所在。既然绝望和希望同为虚妄，就还是唱起“‘希望’之歌”，撒下希望的种子吧；尽管希望有些渺茫，有，总比没有好。就连作者，“也总得自己来一掷我身中

的迟暮”。《〈野草〉艺术谈》作者李国涛几次跟笔者说，他认为，李秉中南下参加革命，入黄埔军校学习，是鲁迅产生希望的一个原因；另一个原因，是女师大学生敢于挺身而出，对杨荫榆的教育方针提出批评。在新的第一年的第一天，鲁迅捧给读者一个《希望》，是特别具有象征意义的。这是一个期待，也像一个宣言或誓言。收《野草》，《全集》第二卷。

身体状况：不适。

情绪指数：**

二日 晴。下午品青、小峰来。夜有麟来。

【笺】

品青、小峰来 品青（1898—1927），姓王，名贵珍，字聘卿、品青。作家。河南济源人。一九一九年九月考入北京大学预科甲部英文班，一九二一年转入物理系，本年六月毕业，任北京孔德学校教员。《语丝》撰稿人之一。小峰（1897—1971），姓李，名荣第，小峰为字。出版家，新潮社成员。江苏江阴人。一九二三年北京大学哲学系毕业，经孙伏园介绍跟鲁迅相识。一九二四年十一月跟孙伏园、周作人等创办《语丝》周刊。本年三月，在鲁迅等人帮助下开设北新书局（三闲居曰，北新书局成立于本年三月，已成公论，大家都这么说，但鲁迅《呐喊》第三版，即北新书局所出最早《乌合丛书》本，据周国伟《鲁迅著译版本研究编目》，却是一九二四年五月出版的，见该书第69页，这是怎么一回事？）以后成为鲁迅著作的主要出版人。当是新年来看望，顺便谈些出版之事。

有麟来 有麟（1903—1951），姓荆，又名艾云、有林、织芳。山西猗氏（今临猗）牛杜镇人。行医世家，较富有。在故乡上学时组织过罢课等活动。后到运城、太原求学。一九二二年冬赴京，在同乡景梅九办的《国风日报》帮忙，开始在该报《学汇》专刊发表作品，一年共发表十余篇。一九二四年入北京世界语专门学校，成为鲁迅的学生，十一月起常到鲁寓请教。经鲁迅介绍，到邵飘萍的《京报》任校对。同年十二月九日创办《民众文艺周刊》。本年春，奉邵飘萍之命，筹办几种附刊，鲁迅所办《莽原》，即为其一。以后担任过多种职务，都不长久，屡屡失业，曾多次请鲁迅托人求职。

三十年代初，在河北怀远县和江苏萧县任教。一九三六年在同乡王用宾的帮助下，在南京国民党政府中央考试委员会任科员。一九三九年秘密加入国民党特务组织。十三岁时在故乡娶一曹氏女，本年在南京跟上海美专学生莫瑛（又叫莫仙英，即金仲芸）相识，一九二七年在上海正式结婚。生有二女一男。一九四九年南京解放前夕，被作为潜伏特务留下，南京解放后被逮捕，一九五一年镇压。其所办《民众文艺周刊》，为《京报》附刊之一种，是鲁迅一块重要阵地。同任编辑者为胡也频（崇轩）、项拙（亦愚）。第十六号（本年4月7日）起改名《民众文艺》，第二十五号（本年6月23日）改名《民众周刊》，第三十一期（本年8月4日）改名《民众》，出至第四十七期（本年11月）停刊。今日来，当为经常性的拜访。

身体状况：不适。

三日 云。晚服补血丸二粒。夜为《文学周刊》作文一篇论。

【校】

血 手稿作“泻”。

【笺】

为《文学周刊》作文一篇论 《文学周刊》为《京报》附刊之一，绿波社和星星文学社合编，孙席珍负责，一九二四年十二月十三日创刊。所作文为《诗歌之敌》，杂文，载《文学周刊》第五期（1月17日），署名鲁迅。文末注“一月一日”作，据《日记》，应为今日。本文是指斥“反诗歌党”的，说：“豢养文士仿佛是赞助文艺似的，而其实也是敌。宋玉司马相如之流，就受着这样的待遇，和后来的权门的‘清客’略同，都是位在声色狗马之间的玩物。”此文开头说：“大前天第一次会见‘诗孩’”。孙席珍回忆，“诗孩”是一九二四年春钱玄同跟鲁迅、陈大悲三人闲谈“诗哲”（徐志摩）时见孙从旁边经过顺手指孙说的，而鲁和陈都表示了首肯。“大前天”当指上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而日记未记。孙席珍说：“一九二四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引者按，应为31日），我去拜访鲁迅先生，是请他为《文学周刊》撰稿，同时也有些问题求教于他。谈话中间，他问我：‘近来你还写

诗吗?’我说:‘不大写了。’他问:‘为什么?’我回答说:‘主要因为越写越觉得写不好,其次也怕受人指摘,说我写诗是另有目的的,所以不敢写了。’鲁迅先生听了,就很诚恳地对我说:‘你觉得越写越写不好,可见你比从前已经有了进步。今后只要多读些古人的和外国的诗篇,可以得到不少启发,再多想想,多练习练习,自然会写得好起来的。至于怕受人指摘,我看大可不必;你写你的,他们指摘他们的,用不着理会他们。’过了几天,他托许钦文先生带了一篇稿子给我,就是《诗歌之敌》。在这篇文章里,先生很慨叹于今日文坛上诗歌创作之冷落,说是:‘戏曲尚未萌芽,诗歌却已奄奄一息了,即有几个人偶然呻吟,也如冬花在严风中颤抖。’我读了很有感触……”(《鲁迅回忆录》散篇上册第367-368页)又据孙本人作《鲁迅先生怎样教导我们的》,他听鲁迅讲课,“从一九二四年秋季开学起到一九二五年暑假为止,整整一年,从未缺课”,见《鲁迅诞辰百年纪念集》第八十六页。收《集外集拾遗》;《全集》第七卷。

身体状况:不适。

四日 晴。星期休息。午后有麟来。下午伏园来。紫佩携舒来。夜衣萍来。译彼象飞诗三篇讫。

【笺】

紫佩携舒来 紫佩(1887—1952),姓宋,原名盛琳,更名琳,紫佩为字,鲁迅也写作子培、子佩。浙江绍兴人。南社社员,也是南社之分社“越社”的骨干分子。曾考取秀才。鲁迅在杭州浙江两级师范学堂教书时的学生,在该校理化科毕业后,回绍兴在府中学堂任教务兼庶务,在山会初级师范学堂任修身教员,这两处都跟鲁迅同事。绍兴光复后,跟越社同仁王文灏等创办《越铎日报》,鲁迅给予支持。一九一三年到北京,由鲁迅推荐,到京师图书馆分馆工作,直到逝世。鲁迅在上海十年,北京家中即由宋照管,是鲁迅一亲密助手。舒,紫佩子。其名为鲁迅所起。许羨苏记下了他给起名的故事:“在以前,宋琳的妻子生了一个早产儿。这在结婚很久而初得孙儿的宋琳的母亲原是一件可喜的事情,但因为早产,照孩子出生和宋琳回家的时间算起来,还不到十个月(实际上只应是九个月零十天),这就使宋琳的

母亲大发雷霆，把宋琳从北京叫回去，要开祠堂门。宋琳求教于鲁迅先生，鲁迅先生以科学的方法，从孩子的未完全成熟的生理上证明新生儿确实是个早产儿，并且给他起了一个名叫‘舒’，一场风波才告平息。不久宋琳把妻子接到北京，组织了小家庭。”（《鲁迅回忆录》散篇上册第322页）

衣萍来 衣萍（1900—1946），即章鸿熙（《日记》又作章洪熙），衣萍为字。作家。安徽绩溪人。八岁从父读书，十四岁上师范学校。一九一七年到南京，后到北京，因无钱读书，就到北京大学旁听，认识了同乡胡适等人。一九二四年秋由孙伏园介绍跟鲁迅相交。不久参加《语丝》筹办，并为该刊十六个撰稿人之一。本年来寓次数甚多。当无别事，来看望而已。

译彼象飞诗三篇论 彼象飞，现通译裴多菲（1823—1849），匈牙利著名诗人，革命家，是他的同胞渴望自由的象征。一八四八年匈牙利革命前一个时期，他在匈牙利文坛起领导作用。他热情拥护法国大革命，怒斥匈牙利黑暗现状，不遗余力地抨击贵族和王室特权。在政治上他是一个激进派，一个受灵感鼓舞的煽动家。他的诗，政治性强，总是充满激情。诗三篇，即《太阳酷热地照临》《坟墓休息着……》《我的爱——并不是……》，以《A. Peiöfi的诗》为题，载《语丝》第十一期（1月26日），署名L.S.。这几首诗是作者前期作品。当时正值民族压迫和国内矛盾激化，作者处在苦闷、彷徨，向往法国革命却又不知如何是好的阶段，心灵上笼罩着一层“淡淡的哀愁”。是作者第一次被介绍到中国。初收一九三八年版《全集》第七卷《集外集》，现收《译丛补》，《鲁迅译文集》第十卷，题目有改，篇数增加。

五日 晴。午后往女师校讲并收去年二月分薪水泉五元。收教育部前年七月分奉泉八十六元。收其中堂书目一本。收《支那研究》第二期一本。收东亚公司通知信。下午至滨来香饮牛乳并买点心。

【笺】

往女师校讲 女师校，即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日记》又作女师、女子师校、女高师校、女师大、女子师范大学等。位于宣武门内石驸马大街。初为京师女子师范学堂，光绪三十四年（1908）成立。民国元年（1912）改名北京女子师范学校。自民国五年（1916）起增设高等部，民国八年（1919）

改为国立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民国十一年七月许寿裳任校长，秋起制订组织大纲，改革行政系统，增设新课程，成立评议会，出版周刊；许致力于提高师资力量，多方延聘专家学者，并邀请北京大学教授来校兼课。民国十三年（1924）初，许辞校长职，返教育部，任编审。二月二十八日，根据许寿裳建议，部令委任杨荫榆为校长，五月二日，改称女子师范大学。本年度（1925）有正科生二百〇一人，旁听生五人。鲁迅于一九二三年九月起，应许寿裳聘，兼任该校国文系讲师，给国文科第二、三两班讲授中国小说史等课。其聘书曰：“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敬请：周树人先生于十二年九月起至十三年六月止担任本校国文学系小说史科兼任教员，每周一小时，月薪十三元五角，按本校兼任教员例致送。此订。校长许寿裳。‘中华民国’十二年七月。”聘期届满后，由杨荫榆续聘。俞芳在《我记忆中的鲁迅先生》中说：“听太师母说大先生搬到西三条不久，杨荫榆来找过大先生，说是送聘书来的，当时大先生婉言谢绝。后来为学生的学业着想，才收下聘书的。”（第13页）许广平、陆晶清等也说到辞职和续聘之事。许说：“一致爱护的鲁迅先生，在学生中找不出一句恶评。也曾经有过一次辞职的事，大家一个也不缺的，挤到教导处，包围他，使得他团团地转，满都是人的城墙，肉身做的堡垒。这城堡不是预备做来攻击他，正相反，是卫护他的铁壁铜墙。接受了这一批青年热诚的先生，终于重又执掌教务。”（《许广平文集》第2卷第11页）《日记》一九二四年九月十四日：“上午杨荫榆、胡人哲来。”即来续聘。

收教育部前年七月分奉泉八十六元 鲁迅为“中华民国”教育部部员。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成功，一九一二年元旦，临时政府在南京成立，临时大总统孙中山任命蔡元培为教育总长。蔡元培邀许寿裳到部任事，许又推荐了时在绍兴山会初级师范学堂担任校长的鲁迅，蔡当即同意，于是鲁迅到部。先在南京，同年五月五日下午七时到达北京。次日报到。教育部设在原学部的“大衙门”里，地址在西单南面教育街路北，宣武门内。教育部除总长、次长各一人外，设有一厅（先叫承政厅，后改总务厅）三司（普通教育司、专门教育司、社会教育司）。鲁迅在社会教育司，当年八月二十一日公布，鲁迅为佾事（按当时规定，“佾事”由总长推荐，总统任免），二十六日被任命为科长（当时公布为第二科，不久，教育部把原第一科负责的“宗教、

礼俗”两项职责移交内务部，原来的第二科便成第一科），担负的职责是：“关于博物馆、图书馆事项，关于美术馆及美术展览会事项，关于文艺、音乐、演剧等事项，关于调查及搜集古物事项，关于动植物园等学术事项”。初到教育部，所有部员每月发六十元生活费，没有区别。被任为佥事和科长后，月薪二百二十元，一九一三年二月起增为二百四十元（实领“九成”即216元），一九一四年领“四等俸”二百八十元，一九一六年三月改为三百元，以后再未变动。但常常欠薪。特别是一九一七年七月以后，开始大量拖欠，有时拖两三年之久。一九二六年鲁迅统计，仅积欠他的薪金即达两年半以上，共计九千二百四十多元。本次所领，即为一九二三年七月分薪金。

收《支那研究》第二期一本 《支那研究》，日本社会科学季刊，河野弥太吉主编，大连支那研究会发行。创刊于大正十三年（1924）。

收东亚公司通知信 新书来到，通知去取。东亚公司，经销图书、文化用品，为日本人开，在东单牌楼。

下午至滨来香饮牛乳并买点心 滨来香，在西单北大街。

【补】

本日被代理部务的教育次长马叙伦任命为清室善后委员会助理员。

六日 晴。晨寄三弟信。寄李庸倩信。午后往世界语校讲。往东亚公司买《新俄文学之曙光期》一本，《支那马贼裹面史》一本，共泉二元二角。钦文来，托其以文稿一篇交孙席珍。夜校《苦征》印稿。有麟来。

【笺】

晨寄三弟信 信未见。为本年第一封佚信。三弟，周建人（1888—1984），原名松寿，字乔峰，笔名克士。生物学家，编辑家，社会活动家。原在本地僧立小学和明道女校任教，并研究生物学。一九一九年在北京大学旁听科学总论和哲学等课程。一九二一年到上海，在商务印书馆任编辑，编写中小学动植物学教科书和《东方杂志》《妇女杂志》等。以后从事反对蒋介石独裁统治的民主运动。时在上海。

寄李庸倩信 信未见。为本年第二封佚信。李庸倩（约1905—1940），

名秉中，庸倩为字。四川彭山人。一九二四年初在北京大学读书时开始跟鲁迅交往，是年毕业于。因表示将赴南方参加革命，鲁迅积极支持（详3月27日“得刘弄潮信”注），热情资助，四次给钱一百元（5月30日50元、7月6日10元、9月1日20元、10月22日20元）。十一月上旬离京，不久有信从上海发，十二月初到广州，入黄埔军校。一九二五年下半年，受派赴苏，入莫斯科中山大学，次年入日本学陆军，一九三二年返国，在南京国民党军事部门服务。鲁迅上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收李庸倩信，十四日发自广州黄埔”，此为复。本年以后所收李庸倩信，述其在黄埔军校学习和受训情况，均未复，因其居址常变也。信已不存。但李秉中一月二十三日信中引有一句，曰“又现在你的方针我以为也好”，应属此信。吴作桥《鲁迅书信钩沉》和刘运峰编《鲁迅佚文全集》皆漏收。详二月七日笺。

往世界语校讲 世界语校，《日记》中又记为世界语学校，全称为北京世界语专门学校。该校系由世界语爱好者冯廷璠（省三）、景梅九、陈声树、陈空三等人发起创办，支持和资助者有蔡元培、李石曾、吴稚晖、张继、胡景翼等著名人士。《全集》注说鲁迅为“发起人和董事之一”，《日记》记有“午后往世界语学校筹款游艺会”，时在一九二三年六月七日。《国风日报》的《学汇》专刊，于一九二二年十月二十二日第十二期发表《快来一同从事爱世运动》的专文，敲响了在我国开展世界语运动的号声。第三十二期发表冯廷璠《创办北京世界语专门学校的提议》，随即发表了俄国盲诗人、世界语学者爱罗先珂的演说《世界语者之宣言》（景梅九翻译，署名“老梅”）。据一九二三年九月二十日出版的《教育杂志》（商务印书馆）第十五卷第九期报道，该校设于西城锦什坊街孟端胡同三十九号，校长因蔡元培“出洋”暂由谭仲逵（即谭熙鸿，生物学家）代理，并已与瑞士日内瓦世界语总会取得联系，又电邀爱罗先珂“从速归任教课”。说“归任教课”，含有爱罗先珂曾参与筹办之意。该校教务由冯廷璠（省三）和陈空三负责。创办时期，二人跟鲁迅来往频繁。当年九月，鲁迅受聘担任该校讲师，“讲文学史或文艺理论”（荆有麟）。上年继续在世界语专门学校讲课。据《日记》，本年到该校讲课，仅此一次。下一次便是请辞了，详三月十一日日记。

往东亚公司买…… 所购均日文书。《新俄文学之曙光期》，是一本有

关苏联早期文学的论著，日本文艺批评家升曙梦著，大正十三年（1924）东京新潮社出版。《新俄小丛书》之一。该丛书是作者游苏归来所作，预告三十册，已出《赤俄见闻录》《革命时期的演剧和舞蹈》鲁迅已购到，此为第三本。《支那马贼裹面史》，又名《中国马贼秘史》，矢萩富桔著，大正十三年东京日本书院出版。

钦文来，托其以文稿一篇交孙席珍 文稿，指前作《诗歌之敌》。孙席珍（1906—1984），原名孙彭，笔名丁飞、丁非等。现代作家。浙江绍兴人。出身贫寒，十六岁中学毕业后到北京半工半读，任《晨报》副刊校对，本年兼作《京报·文学周刊》编辑。后《诗歌之敌》即在《文学周刊》发表。文中提到收稿人，见前三日笺。

夜校《苦征》印稿 《苦征》，即《苦闷的象征》，日本文艺批评家厨川白村的文艺理论集，大正十三年东京改造社出版。全书分《创作论》《鉴赏论》《关于文艺的根本问题的考察》《文学的起源》四章。作者生前只发表了第一、二两章，余稿从废墟中找到。其学生山本修二根据遗稿整理成书，书名根据第一、二章发表时的“端绪”而定。鲁迅于上年四月八日从东亚公司买到此书，九月二十二日开始翻译，十月十日译完。鲁迅认为这本书是“很有独创力的”，而且“多有独到的见地和深切的会心”，他翻译此书，是为了召唤一种“天马行空似的大精神”，以催促“大艺术的产生”，冲破当时因循守旧的思想束缚。许寿裳说：“鲁迅译厨川白村的《苦闷的象征》时，曾对我说：‘这是一部有独创力的文学论，既异于科学家似的玄虚，而且也并无一般文学论著的繁碎。’”（《亡友鲁迅印象记》第55页）鲁迅的译文最早在上年十月一日至三十一日《晨报》副刊连载，为原书的一、二两章。鲁迅曾以此书为教材，在北京大学和女师大等校讲文艺理论课。校印稿，为印制前最后一道工序。

【补】

前所译日本厨川白村论文《描写劳动问题的文学》载《民众文艺周刊》第四号，五号续载，署名鲁迅。为《出了象牙之塔》之构成部分。收《译文集》第三卷。

【附记】

本日《京报》附设之《民众文艺周刊》第四号载《更正》一文，高道一撰文，“疑为鲁迅先生的文字”，原文如下：

上一期，我们也曾到印刷局去校正；但不知是我们去得太迟了，抑是那一次印刷局排得早了些，致错误之处，都未及更正，殊为抱歉之至！我们为节省篇幅起见，其中显而易见的地方，及无关紧要的末节，我们以“由它去吧”四字了之，不来一一更正。惟最后标题为《难》的一篇文章后面所附带的启事内，既排错了两处很重要的标点，又排漏了几个很关紧要的字，今特更正如下，请读者诸君注意！

（一）“本刊意在表现民众思想”下之“，”乃“。”之误。

（二）“欢迎描写第四阶级的作品”下之“。”乃“，”之误。

（三）“替世界被压迫的民族呼吁”一句，上面漏去“及”一字，下面漏去“之呼声”三字而此句下面之标点，乃“；”非“，”也。

作者高道一说：“我之所以产生这样的疑问，是由于鲁迅先生对该刊第十七号以前的文字，负责‘校阅’和‘通读’。因之写出《更正》的文字，乃是顺理成章的事。”笔者未敢肯定，附此以供研究。

七日 晴。下午寄新潮社校正稿。

【校】

稿 手稿作“藁”。

【笺】

寄新潮社校正稿 新潮社是五四运动中有较大影响的一个文学社团，形成于一九一八年十月。社址设在北大一院，即沙滩红楼一层。一九一九年一月创办《新潮》月刊，北京大学中文系学生傅斯年任主任编辑，英语系学生罗家伦任编辑。社员大多是北京大学学生，也有少数教员和校外人士参加。

其中有江绍原、何思源、李小峰、俞平伯、郭绍虞、孙伏园、顾颉刚、叶圣陶、杨振声等。在五四运动中，它与《新青年》相呼应，在提倡白话文、反对封建伦理和旧文学的战斗中发表了多篇犀利有力的文章。一九二〇年十月以后，因前期干部大多出国留学，《新潮》改由周作人主编，顾颉刚、孙伏园任编辑。校正稿指《中国小说史略》上卷。鲁迅于一九二〇年八月起，应邀在北京大学、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后改为北京师范大学）等校讲授中国小说史，每讲完一段，就将讲义稿交付刻印。油印本题为《小说大略》，共十七篇，由北大国文系教授会印发，约十六开，毛边，共一百一十五页。有“周树人”署名。这是现存《中国小说史略》的最早版本。后由北大印刷科排印铅印本，从内容到形式都有较大改动。篇幅增至二十六篇。线装，二十四开。无封面，亦无著者署名。仍作为教学之用。在铅印本基础上，鲁迅又做了全面修改。一九二三年四月，《中国小说史略》上卷编成，十二月一日由新潮社出版。下卷于一九二四年六月出版。上卷（册）十五篇，下卷（册）十三篇。《史略》出版后，受到读者欢迎，新潮社乃于本年二月将上册再版。随后新潮社解体，下册未能再版。后《史略》改由李小峰的北新书局出版。所以本年九月出版的《史略》合订本是由北新书局出版的。此校正稿，指新潮社再版本。

八日 晴。晚衣萍来。夜崇轩、有麟来。

【笺】

崇轩、有麟来 崇轩（1903—1931），即胡也频，崇轩为原名。作家。福建福州人。小时当过学徒。因不甘忍受老板的奴役，只身赴上海，考进浦东中学，家人又送到天津大沽口海军学校学习机器制造。第二年海军学校停办，跑到北京，考大学未被录取，滞留数年。其间，爱上文学，一九二四年开始创作。同年十二月至本年五月，跟荆有麟、项拙等合编《京报》之附刊《民众文艺周刊》。后在上海参加“左联”，一九三一年二月七日被国民党秘密枪杀于上海龙华，为“左联五烈士”之一。上年十二月二十八日，“荆有麟邀午餐于中兴楼，午前赴之，坐中有绥理绥夫、项拙、胡崇轩、孙伏园。”此为胡第一次来寓拜访。二人来，当是为《民众文艺周刊》约稿。

【补】

作杂文《咬文嚼字（一）》，载十一日《京报副刊》，署名鲁迅。本文对“以摆脱传统思想的束缚而来介绍世界文学的人，却偏喜欢使外国人姓中国姓”的现象做了嘲讽。收《华盖集》，《全集》第三卷。

九日 晴。上午往师范大学讲。午后往北京大学讲。下午云。得伏园信，附王铸信，晚复。夜衣萍、伏园来。有麟来。向培良、钟青航来。

【笺】

往师范大学讲 一九二〇年八月二十六日，鲁迅受北京高等师范学校之聘，担任该校讲师。一九二一年一月十二日开始授课，为国文系讲中国小说史。其间，于一九二二年参加了该校国文学会。《国文学会丛刊》第一卷第一期载会员名单，共十六人，朱希祖、沈兼士、马裕藻、黎锦熙、钱玄同、杨树达等均在内，鲁迅名列第六。后又发展沈尹默、徐祖正、张凤举等入人会。鲁迅在该校讲课凡五年半，直至一九二六年八月南下。本次为本年第一次讲课。北京师范大学，“创始于前清光绪二十八年京师大学堂附设之师范馆，旋改为优级师范科，及京师优级师范学堂。民国元年改为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十二年七月改为国立北京师范大学。”（据《校史概略》）

往北京大学讲 一九二〇年八月二日被北京大学聘为讲师。其聘书为：“敬聘周树人先生为本校讲师，此订。国立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中华民国九年八月二日。第一百六十一号。”同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开始授课，先讲中国小说史，后以厨川白村的《苦闷的象征》为教材，讲授文艺理论。蔡元培回忆：“自陈独秀君来任学长，胡适之、刘半农、周豫才、周岂明诸君来任教员，而文学革命，思想自由的风气，遂大流行。”常惠回忆说：“鲁迅先生到北京大学授课是在北大第一院文学院，就是现在的沙滩红楼，地点是二楼第十九教室。‘中国小说史’这门课是选修课，最初选的人不多，后来知道是鲁迅先生讲这门课，选修的人就多起来，甚至校外的人也来听讲。”（《鲁迅回忆录》散篇上册第421页）在北大授课凡五年半，直至一九二六年八月离京南下。本次为今年第一次讲课，实为一九二四年下学期最后一课。

鲁迅在北大讲课情形，孙席珍做了回忆，并详细记述了几次有关写作的答问。孙说他正式听鲁迅讲课，“是从一九二四年秋季开学起到一九二五年暑假为止，整整一年，从未缺课”。鲁迅本年前半年在北京大学共讲课十四次（1月9日，2月20日、27日，3月6日、13日、20日、27日，4月3日、10日、17日、24日，5月8日、22日、29日）。孙所记课堂答问无法确定具体日期，估计在此次讲课前后，兹引一例以见一斑：

有一次，下课钟响过以后，先生刚把书本合拢，向同学们点头示意，准备离开教室，当他脚步尚未移动时，好多位同学一拥向前，在讲桌边围成一个半圆形，问长问短，先生一一解答。这时人多口杂，有些提问，简直分辨不出来。其中有位同学提高了嗓子说：“周先生，您的文章写得这么好，有什么秘诀，可以教给我们吗？”

先生听了微微一笑，略为思索，答道：“我的文章写得并不好，我也没有什么诀窍可以传授给你们，我只会讲点小说史，不会讲文章作法。目前市面上有《小说法程》《文章作法》一类书籍出卖，但我从来没有看过，因为我不相信看了这些书就能写出好作品来，也没有听说过哪位有名的作家是看了这些书以后才从事创作的，所以现在也绝无诀窍可讲。

“那么，文章到底该怎样才写得好呢？我认为首先还是多读一些大作家的作品，从这些作品中去领会、学习的好。记得从前俄国有位批评家，在《果戈理研究》一书中说过，要想知道应该怎么写，还须从不应该那么写那一面去考虑，这可以从一些不成熟的作品中去研究，哪些字句可以删去，哪些段落应该缩短，哪些地方必须改写，哪些地方还要加强，但加强并不是添油加酱，弄得臃肿累赘的意思，加强是要求增加表现力，文字的运用仍须力求精练。大意如此，我认为这位批评家的话，对我们是很有用处的。”

讲到这里，先生略一停顿，平时我们从未见先生在课堂上吸过烟，但这时已经下课了，他破例拿出一支来点上，吸了两口，继续说：“我刚才讲要精练，就是说，写文章千万要少说废话，不要有败笔，不要拖泥带水，不要故意去拉长。什么叫作败笔呢？败笔就是废话。不要有败

笔，就是一切不必要、不相干的言语要尽量避免，一切可有可无的字句能不要就尽力不要，如果已经写在上面，能去掉就尽量把它去掉。我自己写文章，总是这样：宁愿将一篇小说缩短成为一篇小品随笔，决不将一篇小品随笔拉长成为一篇小说。总而言之，概括起来，就是一个‘删’字。”他在黑板上写了个大大的“删”字后，回过头来接着说：“你们问我写文章有什么秘诀，我也说不出；要说经验，略有一点，这个‘删’字，就是从我的经验中归纳出来的。”

以上这些话，后来先生在《答北斗杂志社问》一文中，也曾说得非常明确，但那是几年以后的事；当时我们听先生这样讲，无不觉得十分新鲜，认为这些话，对我们确实具有极大的指导意义。不料这时钟声又响起来了，是上课钟；下一节课是别位老师上的，别班同学涌进来了，大家只好退出，先生也跟着我们出来，向那位老师招呼了一下，表示歉意。我们知道先生的话还没有讲完，但也只好怀着怏怏然的心情，无可奈何地各自走散。

这之后隔不多天，遇见了一位女师大的同学，谈起写作的事，我把先生指导我们的话告诉了她。她听了，很得意似的笑道：“我们也问过先生，他也给我们做了指导，意思大致与你刚才所说一样；不过他对我们讲的话，比在你们那边讲的还要多些。”

我忙问：“真的吗？他还讲了些什么？”

那位女同学见我似乎很着急，故意慢吞吞地说道：“你别急，待我告诉你。先生给我们阐明了‘删’的如何重要之后，回转头在黑板上写了‘割爱’二字，接着讲：‘要做到会删，还须懂得割爱。割爱的意思是要能够舍得，不要舍不得。我们写文章，主要是为了把自己的思想感情传给别人，只要这个目的能够达到，其余都是末节。比如说，我们拿起笔来，有时灵感一到，什么美丽的辞藻呀，机智的言语呀，奇警的文句呀，源源而来，自己看了，觉得赏心悦目，得意非凡。当此之际，你就应该有所平衡，知所抉择。如果这些丽词、警句，有助于你达到写作目的，自不妨予以保留，加以利用；否则就该当机立断，坚决把它删掉，毫不可惜，这就叫作割爱。因为倘不如此，文章就会弄得不成样子，不是头重脚轻，就是尾大不掉，甚或浑身臃肿，反而变成四不像的